

出门庆元旦，回家过新年

——老舍、鲁迅、冰心怎样跨年

老舍

主管部门不许放假

1918年9月，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青年老舍走马上任，在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，平常住校，假日回家。1919年元月底，农历1918年的最后一天，老舍回了家。母亲兴高采烈地备办年夜饭，准备过个团圆年，却听老舍说：“妈，您甭收拾了，一会儿我还得回去，今天学校不放假。”

两个小时后，老舍果真回了学校。

所有人都知道，春节是传统中国最隆重的节日，学校、机关和绝大部分企事业单位都会放假。老舍作为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，怎么能不放假呢？

原因很简单，主管部门不许放假。

1918年11月，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通告：“为实行国历，废除旧历，绝天帝王思想，破除迷信旧习，促进革新事业，吾教育界当作表率，凡在旧历新岁，均不能休务，以示提倡。”这里“国历”指公历，“旧历”指农历。公历从西方引进，象征革新；农历在中国产生，象征传统。民国政府破除传统，提倡革新，想从社会习俗中铲除旧中国的专制残余，势必要推广公历，取代农历。要破除传统，就得破除农历；要破除农历，就得破除传统节日；要破除传统节日，就不能再让人民群众继续庆祝传统节日中那个最为盛大、最为热闹、最为隆重、最为牢固的农历春节；要不让人民群众庆祝春节，就得让公职人员做好示范；教育干部和教师都是公职人员，理所当然要带个好头，所以从1918年起，教育界就别过除夕了，大年初一就别放假了……这就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逻辑。

老舍有哥有姐，姐已出嫁，照规矩必须在夫家过年，年后才能回娘家；哥哥在外当差，春节回不了家。老舍一回学校，家里就剩下老母亲一个人过年，听着满城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甚是凄凉。

老舍是孝子，不想返校，可是上级有令，不能不从，只得出门往外走。多年以后，他在一篇散文里回忆道：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，才走到学校。路上必是很热闹，可是我并没看见，我似乎失了感觉。到了学校，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。他先问我：“回来了？”我行了个礼。他点了点头，笑着叫了我一声：“你还回去吧。”这一笑，永远印在我心中。假如我将来死后能入天堂，我必把这一笑带给上帝去看。

这说明，老舍遵照上级通知回到学校，在校督导工作的学监额外开恩，又让他回去了，这让老舍无限感激，以至于把学监的笑容永远印在心中。

学监比校长级别高，受教育主管部门派遣，巡查下辖各校工作，有点儿像汉朝的“督邮”和明朝的“巡按”。那年除夕，学监可能奉上级命令，专门视察各校有没有阳奉阴违，偷着放年假。接连查了几个学校，师生大概都走了，只有老舍这个新任校长很听话，学监不忍心，干脆让老舍也放假算了，学监也可以撂下挑子，回家过年。这样一来，教育部不许放年假的通令也就成为一张废纸了。

事实上，从民国政府成立那天起，不仅仅是教育系统，各级政府都在不断地遏制传统春节或者尽量缩短春节假期。

1921年12月16日，被北大聘为教授的成都文学家吴虞收到通知：“本学年新历年假放一星期，旧历春节放假二日。”公历元旦是新新年，放假7天；农历春节是老新年，放假两天。

1930年1月10日，浙江省政府再次提倡新新年，打压老新年，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一，“禁止市面售卖鞭炮、门神、祭祀用品。”

鲁迅

元旦冷清，春节热闹

不管民国政府采用什么方法，都没能“彻底废除旧历”，没能遏制住人们过春节的热情。

1930年2月5日，《北平时事公报》评论道：“旧历废而不止，人们都沿着习俗，旧历的新年还是比国历的元旦要热闹。旧历年一到，商店依然歇业，学校依然停课，大人依然备年货，孩子依然要糖果，噼里啪啦的牌声依然像爆竹声一样热闹，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至少有一桌在玩着，好像旧历年赌博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谁会来禁止呢？”

即使努力打压旧历年的政府也抵挡不住旧历年的诱惑。查《鲁迅日记》，从1913年到1926年，鲁迅在教育部上班那十几年，元旦放假一般三天，春节也是三天，被废止的旧历年与被提倡的新历年“打了个平手”。

民国时过元旦，官样文章做得特别多。从北洋军阀治下的北方，到国民党割据的南方，从1928年蒋介石统一南北前，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每年元旦都是党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公共事业单位最忙时。元旦的忙，是忙着庆祝。

鲁迅在广州经历过一次：元旦当日，中山大学、广州市政府、广州各中小学、广州各商会、妇女会、育婴院、国民党广州党部均派出代表，群集于粤秀山公共运动场。运动场上高搭主席台，上午10点，学生代表、广州官员、各机关职员、各商会代表到齐，总计几万人。市长、教育局长、中山大学校长、学生代表、商会代表讲话。然后是中学生表演体操，小学生表演国旗操，大学生进行体育比赛。下午3点，参会者排队向市区进发，市长领队，军乐队伴奏，发放传单，宣讲“施行新历”对于“革命”的伟大意义。傍晚游行才圆满结束。

那时南北分治，广州作为国民党大本营，元旦大会有声有色。北方一切庆祝仅具形式。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金事，每年元旦例行的庆祝无非是上午在部里开个小规模的庆祝会（或提前一天开），下午回家过节。若碰上地方闹灾，庆祝会就会变成募捐会。

可以说，鲁迅在北京工作十几年，每年的元旦都过得冷清。他日记中写到元旦假期，几乎都是“休假”“无事”“上午某某来”。倒是农历春节，鲁迅日记里会多出“旧历元旦也”以及“某某招饮”“治午餐招某某”等关于相互宴请的记载，比元旦要热闹一些。

普通人也是如此。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《1942—1945：我的上海沦陷生活》记录了日军侵华期间一个上海五金店小伙计颜滨的日常生活。每年元旦，颜滨供职的店铺不放假，仅仅是听从官府命令，在店铺外张贴“庆祝新年”的标语。而春节一到，店铺必定歇业7天左右，伙计放假，或回乡探亲，或在上海逛庙会、逛商场、逛大世界。颜滨是宁波人，父母双亡，姐姐在上海定居，他一般都跟姐姐过节，与其他亲戚在一起打牌，用通宵的“雀战”来迎接旧历年。

颜滨说，上海人平常小气，过年大方，春节互相拜年，口袋里一定要塞满一堆“小茶包”（内装大洋一元或小洋二角的红包），到了别人家，见了孩子得给压岁钱，对方佣人端来盖碗茶时也要给佣人发红包。老爷太太对佣人同样大方，人人都有年赏。有些佣人不关心雇主一个月给多少工钱，只关心雇主能给多少年赏，以及大概有多少客人到雇主家拜年——客人和雇主的年赏加起来，可能比一年工钱都多！



冰心

新年漫漫探亲路

说到压岁钱和年赏，不能不提到冰心。冰心小时候住在烟台海军学校附近，母亲管家，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老妈子。大年初一早起，母亲给孩子和佣人发红包，每人一枚“锃亮的墨西哥银元”。这是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流入中国最多的外国银币，币面铸了一只雄鹰，又叫“鹰洋”和“墨洋”，重量稳定，含银量高，是民国时期受欢迎的硬通货。按购买力估算，一枚鹰洋约相当于现在两百元人民币，如果按清末民初老百姓的收入估算，就是一个青壮劳力在大城市打工十天的收入。冰心出身于世家大族，父亲做到海军部次长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冰心去申报馆捐款劳军，捐的就是她攒的十块银元压岁钱。

冰心先是在北京就读最好的教会中学（贝满女中），又在北京就读最好的教会大学（燕京大学），毕业后留学美国，从美国归来后回母校当教授，不久与留美博士吴文藻成婚……

冰心在北京当教授时，父亲去上海担任海道测量局长兼全国海岸巡防处长，迁往上海。每逢春节，冰心都要去上海探亲。那时只有轮船和火车（民航1935年才运行），而且极慢。究竟多慢？看看冰心1929年12月的那次探亲旅程就知道。

1929年12月14日，农历十一月十四，离旧历年还有一个多月，冰心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。12月14日一大早，冰心给旅行社打电话，要求代买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，得知最快19日才能有票，还是最差的四等舱。冰心订下19日的船票，再去火车站买好去天津的火车票。冰心12月18日下午4点50分坐火车，晚上7点到天津，花了两个多小时，再坐公交车去天津国民饭店休息等第二天上船。12月19日下午2点30分，冰心登上“顺天”号轮船，夜里10点船才开。船舱挤满人，冰心乘坐的小舱不过五六平方米，却有上下两层4个铺位，除了冰心，每个铺位的乘客都带孩子，吵骂声、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、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，闹得冰心没法休息。“顺天”号驶出塘沽，风浪很大。冰心打小见惯风浪，从不晕船，其他乘客却呕吐起来，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，只听见呕吐。每到吃饭时，茶房连声叫喊“吃饭咧”，她都没胃口，不饮不食，只想睡觉，因为睡着了就安静了。

12月22日下午6点，轮船停靠在上海浦东，路上用去68个小时。如果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，从北京回上海要用八九天！可见民国时期回家过年有多么难。

如果冰心1934年回家过年，会轻松很多。1934年，京沪虽也没直达列车，但可以换乘，不用再走海路。譬如她上午9点在北京东站乘特快列车出发，第二天晚上8点到苏州换乘“沪宁特快”，当晚10点抵达上海北站，全程57个小时。有一点要注意：冰心必须能保证买得到特快列车的车票，因为每到临近元旦，特快列车票总是很抢手，要托关系才能买得到票。 文图来源：北京青年报